

◀ (上接4版)

个非常聪明的人,有时候甚至有点“滑”,他如果知道你很喜欢“信古”,就会说“信古”,但如果面对我,他就会说“释古”。李先生会看人,从而针对他们的兴趣。“疑古”时代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,我们读书人都应该有怀疑的态度,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,没有质疑怎么会有新的创造?我们有好几种责任,一种是传授传统知识,一种就是要有创新。

但我个人觉得“疑古”过分了,把几乎所有的古书都当成伪造的,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在西方学术界,也有很多人说疑古派非常科学,我也不赞同,疑古派的目的就是要用任何办法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。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曾经“疑古”的顾颉刚先生就已经开始参考一些出土文献,大体上给予承认,但是最终没有具体改变。顾先生是胡适的学生。与学生不一样,1930年代的胡适改变了,他看了安阳的发掘以后,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是不对的。虽然中国国内有很多人批评胡适,但我个人觉得,一个读书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基本思路,这还是很勇敢的。

我不赞成做中国思想史和希腊思想史的对比研究

文汇报:您曾表示“汉学无分国籍国界”,这是对学术交流融合的一个期盼,但我们还是想听您谈谈中外学者在做中国古典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。

夏含夷:一般会说老外的学术态度比较客观,中国学者有爱国主义精神,有发扬中国文化的驱动力,可能就会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少一点。这话虽然有一些道理,但也不是肯定的,要具体看是什么中国学者、外国学者。

别人不谈,就说说我自己吧,谈不上什么优势但可以说是一个特点。我在芝大开始教书时,是唯一一个做中国古代研究的,也是唯一一个做宋明以前研究的。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课,都由我来设置和教授,有古典学、历史学、文学、考古学,虽然教得不算好,但自己也跟着学习了不少。中国学者就没有这个必要,你如果是历史系的,不但专门做历史,而且是断代的,可能只做西周,只做东汉,等等,眼光就比较窄。我有时候研究历史,但也涉及文学、

考古,这或许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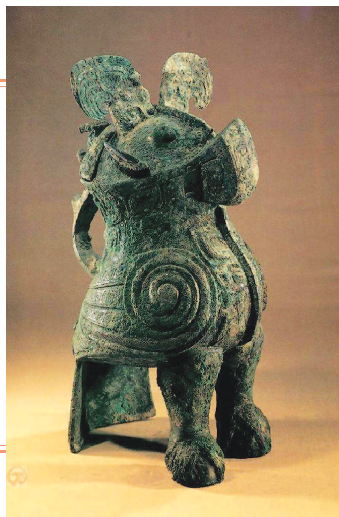
文汇报:那是不是意味着研究古典学,最好是要能融会贯通各学科呢?

夏含夷:这其实也正是裘先生的建议。差不多3年前,我在复旦做了一个不能算是演讲的介绍,给老师和研究生们介绍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新出的一本书 *Philology*。那本书写得非常好,介绍了 *philology* 的历史。*philology* 就是古典语文学,但是包括现在分类的各学科,诸如人类学、考古学等。一直到1850年,研究古典学就是什么都要知道,后来的170年里,学科分类了,这个趋势并不是积极、肯定的。裘先生也有这样的考虑,不过,他在复旦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,目前也只是做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。

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兴趣,不能满足这一点的话,肯定做不好。古典学是过去的东西,但西方有句话说“the past is not past”,“过去不是过去的”,它一直在改变。我的老师爱新觉罗·毓璠的过去和我的过去就完全不一样,我也相信,再过50年,人家的过去跟我的过去,也不一样。过去一直在演变,不但基本资料在变,人们的看法也在变,变得更复杂了。我们不但要了解过去,还要了解过去和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有什么看法,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根据上一辈、上上一辈的人来的。比如我们对商周历史的认识,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根据清代学者来的,我们当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,但如果不知道那些过去的话,就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些影响。

文汇报:就您所知,西方汉学界目前有没有比较明显、集中的研究兴趣和焦点?

夏含夷:这比较难笼统概括,毕竟都有各自的着力点。就我自己来说,这20年来一直参



1976年
出土于安阳
殷墟的妇好
青銅鸞尊

加一个口述文化和写本文化的辩论。古代的写本文化现在成了热点,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口述文化的观点。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就是《诗经》是什么时候写的,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战国才写成。宇文所安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采访,他认为中国虽然很早就有文字,但不会用文字写诗。我是完全不赞成的,如果中国文字不是起这个作用的话,那我40多年来的研究就全浪费了。我一直在看青铜器铭文,是可以表现诗意的。

口述文化和写本文化的辩论还涉及另一个辩论,即应该以什么研究方法为主。对我来说,基本知识和资料都是中国的,但另外有些看法认为我们应该去比较,做比较文学、比较历史学。比如,做中国的思想史就应该跟希腊思想史做对比。我不赞成!我对希腊没有专门研究,虽然最经典的那些在大学时期都看过,但是,看,和真正做研究是两回事。如果一定要做一个对比,那就要降低到最低的标准。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问题,中外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异同。毕竟双方的基本知识不一样,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把握要多得多,那我更要把针对中国的资料当作主要责任了。

2005年,老师爱新觉罗·毓璠过100岁时,我去拜访他,谈

了有两个钟头。他说中国内地现在有一种新的《周易》,并不是咱们孔子的《周易》,老先生还从书架上抱起厚厚的那本书扔在一边。他是不要看新东西的,因为年轻时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知识体系,对中国传统文化什么都知道,每一个因子都有它的位置,能围成一个圈,百分之百,什么都不缺。如果有新的东西,根本插不进去。一方面来说,这非常美丽,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通盘的;但是另一方面,现代的学者有创新的责任,又有这么多的考古发现,怎样能插进去这样一个完美的圈子呢?其实现在才发现,我们所谓的完美是非常缺乏的,对中国古代的了解就只是一小部分。不过,有些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,他们认为知道自己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。因为我不知道,所以必须下一点功夫,或许到最后都不一定全知道,但至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。

有些中国年轻学者太好奇了

文汇报:您目前有没有很想做,但由于精力或者其他条件限制而没有展开的研究?

夏含夷:就在前两天晚上,我还跟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提起,我年轻时夏天没有课,拼命做研究,现在基本上不做了。他们说大家都是这样,年纪大了,也有的做领导了。现在的我主要给中国国内组织一些项目,因为我在国外的关系,在中国也稍微有一点名,很多学生愿意来做翻译,在武汉大学、中西书局、清华大学都有翻译的项目。不过,这些都不算是做研究,更像是工程一样。1990年代,我们第一次听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,都吓了一跳,想着文科怎么会是一个“工程”?现在我理解了,做的很多项目也都是工程,贡献比我自己做

研究要多很多。以前天天坐在办公室里,就是看书,乐在其中。现在的我,可能就不是做研究的阶段了。

文汇报:您和中国古典学界交流广泛,能不能谈谈对中国年轻学者的看法?

夏含夷:中国的很多年轻学者都做得非常好,现在有这么多的新的资料,大家都还在整理,这是基础。整理好以后,希望能再进一步做些研究。如果要有批评的话,就是中国年轻学者太好奇了,总是好奇最新的东西。比如郭店简刚出来的时候,中国古典学几乎都在做郭店,上博简出来后,又一下子都跑去做上博简了。很多年轻人一有想法就发在网上,这和“素人”做研究还是有所区别的,要沉淀一下。

文汇报:对想走入中国古典学大门的年轻人,您有什么想说的吗?能否谈谈西方的中国古典学教育?

夏含夷:中国古典学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,只要年轻人肯进去,也就进去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优点,就是汉语水平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好,很多人在高中已经开始学汉语了,我到20岁才开始。他们也很容易到中国来,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可能,当然,去台湾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。我的老师倪德卫古代汉语水平很高,但一句汉语都不会说。不光是他,那个时代很多汉学家都是这样,研究做得很好,但不会说。

芝加哥大学有一点可能跟美国其他学校不一样,就是非常强调古典学的学生要知道出土文献。有些学生可能不是专门做这个的,但我们要求他们要明确自己受过这样的训练,不是做出土文献的,也要知道怎么做,知道出土文献的基本问题在什么地方。芝大觉得考古出土的东西是最新也是最有意思的。我跟同事夏德安先生有共同的认识,但也不一样。他就完全放弃传统东西,我还是要看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。比如,现在有很多老外在辩论《论语》,我们可以利用出土文献来看看它是怎么创造、流传的。从郭店简、上博简里面,虽然没有找到一个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但是跟它们相似的,比如郭店简的《缁衣》,就应该跟《中庸》是姊妹篇。我要求学生都要看《中庸》《缁衣》,还要看和《礼记》里的《缁衣》有什么差别,会不会影响我们对《中庸》的理解。

我不谈其他大学对学生的要求,至少芝大的学生在毕业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术养成。



爱新觉罗·毓璠